

参 考

苏联与东欧

资料

苏联文艺大事记

(1982年11月—1985年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4

1985

苏联文艺大事记

(1982年11月—1985年3月)

一九八二年

十二月七日 《苏联埃文化报》刊登题为《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各族人民友谊的旗帜下》的长篇报道。报道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各创作协理事会和各创作团体理事会在莫斯科联合举行全体会议，庆祝苏联成立六十周年。会上一些理事会负责人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努力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苏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主持了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苏联作家、全体文艺界知识分子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品质，使人们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他们支持一切先进事物，争取新的艺术成就，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实际生活本身，共产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党的思想，党的政策是我国文学的基础。

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主席谢·米哈尔科夫发言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规模的扩大和复杂化，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直接职责是在日常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参加战斗，成为党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对外政策的助手，用自己的笔和生动的语言反击侵略性的资产阶级宣传。

列宁格勒高尔基模范大剧院总导演格·托夫斯特诺夫戈

夫讲话说，要寻找新的途径来创作反映苏联现实的宏伟作品。当代主人公是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有社会积极性的人，他应是真实的尖锐冲突的中心，并最后战胜这种冲突而取得胜利。不要怕尖锐的冲突，那怕主人公的自我冲突。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否则就会为琐碎题材、无聊的消遣等留下缺口。

苏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主席维·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指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质量问题。常常看到在数字和事实背后没有活生生的人，缺少人的性格、思想和感情，缺少各不相同的个性。

莫斯科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费·库兹涅佐夫讲话说，对于生活和文学来说，塑造合乎时代社会理想与公民理想的主人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人民和党期待我们令人信服地介绍我国现实、苏联生活方式、现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潜力。同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也好，在创作中也好，都要反对矫柔造作的“虚假现象”，对平庸粗浅的东西持不调和态度。我们不能容忍思想美学上的劣品，不能容忍对生活采取形式主义、事务主义、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敌对的意识形态以及仇视人类的表现要采取进攻态度。

十二月二十一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庆祝苏联成立六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做了长篇报告。报告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指出：“令人信服地、具体地展示我们的成就，严肃地分析生活中经常产生的新问题，新颖的思想和生动的词句，这是改进我们的整个宣传的途径。而我们的宣传应当永远是真实的、现实的、又是有意义的、通俗易懂的、也是更

加有效果的。”

一九八三年

一月 苏联国家电影业委员会、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分别开会，总结一九八二年苏联电影业的工作，讨论一九八三年的任务。

苏联国家电影业委员会主席叶尔马什在报告中提到的被公认为“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现实意义”的影片有：故事片《个人生活》、《火车停驶》和《希望与支柱》，历史题材片《红钟》（苏、墨西哥、意大利合拍）。而《梦中的飞行与现实的飞行》、《生日》和《集体观戏》等片则被列为“有某些差错的影片。”

选题问题是这几个会议议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大家都强调不要让“琐碎的事、生活问题和各种家庭纠纷”成为剧作家与导演注意的对象，不要把现实理想化，也不要歌颂“抽象的善”。不要迎合少数观众的“消费心理”。避免拍摄“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祖国与人民等概念”的“灰色片”。普遍提到要拍摄有“紧迫意义的影片”，要歌颂正面人物，要描写新的集体主义精神，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题材。这些会议提到。为了提高影片的艺术性，电影工作者要提高专业水平，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提高责任感，避免公式化。不能容忍粗制滥造，“影片过于沉闷和晦涩”等现象。每个电影工作者都应思考自己的影片“会给群众灌输什么思想，会给青少年播下什么样的种子。”

一月八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表题为《和平、缓和、文

化的重要意义》的署名文章，文章说，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激烈，西方企图利用文艺手段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争夺青年一代。文章强调，西方心理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拉出去”，当前苏联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世界观教育，开展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批判，要为争取人们的心灵而斗争。

一月十一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表社论《当代人的形象》。社论说，苏共中央《关于文艺杂志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联系》的决议中对艺术家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作了明确的阐述：“新的一代苏联人需要在精神上和时间上更接近他们的正面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要作为一种艺术发现被人们所认识，影响人们的行动并反映人民的命运。”社论说，时代本身要求艺术家们广泛探索和贡献出大规模的概括苏联当代人最美好的品质的形象。

一月十七日 《真理报》十八日报道，苏联美术工作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开幕。苏美协理事会主席H·A·波诺马廖夫做了工作总结报告《美术家崇高的社会使命》。报告人指出，苏联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实质在于积极干预生活，确立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现在美术家们面临着社会生活提出的更加广泛和崭新的任务，即用各种艺术形式充实苏联人的精神生活。牢固的世界观、深刻的思想信念是创作的可靠基础，而且能帮助美术家了解生活的真谛。

一月二十六日 《文学报》报道，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听取《北方》杂志的创作工作报告。这是中央关于《文艺杂志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的文件公布以后的第一个文学

刊物的创作工作报告。《北方》杂志主编И·古萨罗夫在会上发言，В·里特文诺夫，А·米哈依罗夫，И·叶列明，В·杰缅季叶夫等参加了讨论。大会主席、苏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对讨论进行了总结，他在指出《北方》杂志的成就之后，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反映人民的今天，反映集体农庄的新事物的大型作品少；有些作品反映的面狭窄，题材琐碎，情节和性格公式化；诗歌中表现创造性劳动和当今问题不够。杂志很少注意国际题材，很少刊登揭露意识形态敌人的文章。文学批评缺少深刻的社会概括，对生活提出的迫切问题分析不够，对有弱点的作品缺少原则性的批评。马尔科夫在强调了党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之后指出，这次会议已超出一个刊物的范围，问题涉及到其他文学出版物和所有苏联作家。

一月二十九日 塔斯社莫斯科电：根据党的二十六次决议、苏共中央决定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和在苏共中央、苏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联合举行的苏联成立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提出的原则与结论，苏共中央就进一步改进宣传工作问题举行了出版、通讯社、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中央意识形态机构等部门工作人员参加的讨论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鲍·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米·齐米亚宁和康·鲁萨科夫都作了报告。讨论会上交流了报道工作和宣传工作的经验。

一月九日 《文学报》刊登署名文学家的文章《存在即行动》。文章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主要、最原则性的成就之一就是正面人物形象提到首位上来。然

而现代文学家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共产主义事业向他们提供的极其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关注而拥有的巨大创作潜力。文章指出，苏共中央关于《文艺杂志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的决议要求把塑造当代人高大的、令人难忘的形象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作家的任务是塑造“有所开拓、能影响人们的品行、反映人民的命运”的主人公。作家、文艺刊物和创作协会都应“在社会重大题材方面”进行探索，必须“使苏联人树立应有的生活目标、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和消费心理”。现在报刊上往往有一些不健康的、艺术性差的作品出现，作者的立场模糊、主题狭窄浅薄、人物猥琐，只盯着一些无意义的生活琐事，既看不到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斗争，也看不到集体劳动中的英雄事迹。文章认为在文艺评论中背离马列主义美学方法学原理、在评价历史和当前的现象时忘记了阶级的、社会的立场是特别不能容忍的。时代要求文艺评论家作出明确而有原则的评价，要有政治家的热情，有科学根据，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谈论实际生活和文学中的现象。

二月十五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表社论《电影中的道德主题》。社论说，电影艺术的教育使命是银幕艺术中最崇高、也是最困难的使命。最近有不少道德题材影片，这一趋势具有教育潜力。但是也正是在这类影片中有许多不合要求的影片。最近有部影片《不能说：“别了！”》引起很大反响，该影片脱离生活，陷入渺小的日常生活。而学校生活影片则应受到赞誉，如《活到星期一》、《无权转交的钥匙》、《童年之后一百天》等。苏联人应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艺术家面临的问题。电影艺术家应向广大观众回答这个问题。

二月二十四日 《苏维埃文化报》报道，苏联电影业委员会举行会务扩大会议，叶尔马什作总结报告并提出今后任务。他指出，要不断巩固和加深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新事物并给以支持。苏联艺术家不应对善与恶持无所谓的态度，在审查剧本、挑选导演、摄影师、美工人员和电影演员时，要把技艺作为衡量其价值的主要标准。不能再容忍粗制滥造的剧本、平庸无能的导演以及呆板的剪接、悲戚忧郁的格调和单调乏味的情节继续存在了。许多影片缺乏准确的社会含义，没有明确的道德标准，往往把某种抽象的善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我们应该恢复歌颂生活中美好事物，歌颂先进事物和新生事物的激情。这里不是说要把电影引向粉饰生活和发明某种理想的现实。

叶尔马什谈了一九八三年的拍片计划，一些著名导演和剧作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苏共中央文化部长沙乌罗出席了会议。

二月二十六日 《苏维埃文化报》刊登苏共中央《关于白俄罗斯库帕拉模范剧院党组织工作的决定》。决定说，剧院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创作人员中提高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的效果。同时党组织可以对剧团的创作活动产生更加有效的影响。目前，剧目中缺少新作品，缺少从党的立场出发洗练地反映苏联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和我们同代人性格的典型特点的作品。剧院领导和党委会在选择脚本方面没有经常表现出必要的原则性和严格的要求。对个别作品和导演手法中出现的思想创作上的问题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创作新剧本，特别是现代题材的剧作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古典剧目少，剧目显得贫乏，演员和观众都不满意。

决定还说，剧团的任务是教育人们对一切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准则的行为采取不容忍的态度，使苏联人树立积极的生活立场。

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集体中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对于争当主角和利己主义的表现，对艺术上搞一言堂和其他不道德现象进行斗争。决定还对党组织应做的其它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

三月一日《苏维埃文化报》发表社论《才能和职责》。社论说，剧院党组织的基本职责是：在集体里维持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同争演主角和个人主义的表现，同追求艺术专制及其他破坏道德的现象作斗争。要完善党的工作形式，坚决消除形式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废话，对作出的决议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积极运用管理活动的监督权。在集体中建立有利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有效地推动创作环境的条件。

三月五日《苏维埃文化报》以《主要目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为题，刊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部长杰米契夫在文化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加了编者按。杰米契夫在报告中总结了上一年的工作并提出今后的任务。他说，凡是提出严肃的社会问题、世界观和道德问题的剧目，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对苏联的严肃音乐和古典作品的兴趣开始增加。苏联宏伟的宣传作品，苏联的画展都受到公众日益广泛的注意。这些积极的过程正在提高苏联艺术的教育作用和思想效果。关于艺术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群众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这一问题，在此可以找到答案，剧院上演的一些剧目探索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途径，音乐和塑造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缺点和问题也不能忽视。戏剧舞台上还有不少粗糙无味的剧目，一些剧院过分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剧本，本国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得不到反映。科技革命和生产题材以及农业题材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拓和发展。一些地方话剧还在靠反映五十年代的问题来混日子。

杰米契夫在报告中说，美学教育日益重要，我们这里还存在西方时髦的影响，特别在流行音乐方面。克服这些消极倾向的途径是改进美学教育系统。文艺批评仍是薄弱环节，它常常是平铺直叙、照相式的、吹捧甚至偏袒，水平不高。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不应怕讲真话。文化教育机关应成为党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基地，文教工作不仅是休息和娱乐，而且要培养创作技能、公民责任感和集体主义感情。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提_高文化宫和俱乐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文化教育工作中干部流动性大、专家不足，要改进这种状况。

三月十六日 《文学报》发表理论文章《艺术与革命》。作者奥夫相尼科夫在文章中指出，在苏联美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对复杂的艺术现象还存在庸俗社会学观点”。近年来苏联提出了各种方法“作为科学认识的方式”，如结构学、符号学、信息学、具体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他认为，在美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但是对于它们加以普遍运用的任何企图，“其后果都是危险的”。符号学，因为过于绝对化，在揭示艺术本质时是有缺陷的。实验心理学在类似的情况下将降低艺术的认识可能性。信息学将使评价艺术的所有准则变成报表和纯粹的数字统计。结构学虽然能够显示艺术或个别作品内部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但是它忽视艺术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揭示这一系统同外界的因果关系时便成了

障碍。他的结论是：“只有辩证法才能避免片面性和僵化”。

三月十七日 塔斯社莫斯科电：莫斯科召开了全苏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州委书记、一些部、主管部门、社会团体、舆论宣传工具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苏共中央书记米·齐米亚宁作了题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报告。会上指出，各级党委正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采取措施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性政治工作。会上特别提醒注意。宣传鼓动应当具体而又有说服力地进行，同苏共的社会经济政策紧密结合，要真实而又切合实际，要有趣而易懂，构思和语言要新颖。重要的是树立苏联人的科学世界观，教育他们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并对他们进行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教育，使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以及危害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行为的种种表现。

四月十六日 《苏维埃文化报》刊登哲学博士尤·卢金的题为《艺术和个人的政治文化》的文章。文章首先介绍了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利，一些青年思想幼稚，有“消费心理、依赖心理和实用主义”。他们对苏联社会发展采取吹毛求疵的态度，“给苏联的现实抹黑”。和平主义思想不利于“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的加强”。文章分析了造成思想工作薄弱的原因，认为首先是因为“现代世界的发展是个复杂、内容纷繁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其次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宣传，加上苏联宣传机关本身的弱点。文章谈到了流行音乐及某些外国影片对青年的不良影响，文章最后论述了艺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对创作知识分子提出了要写正面人物与

反面人物教育人民的任务。

五月四日 《文学报》发表理论文章《文学的革命天职》。作者弗里德里德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学生和继承人的遗训是：（1）、对生活的革命真理及其真实的典型特征和环境深刻而热烈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以人道主义传统为基础的）；（2）、创造性地发展世界艺术的经典作家所有富有成果的创作方法，同时对所有当代的、进步的创作方法是开放的；（3）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党性。他认为，由于作者的个性，在长篇小说、戏剧、抒情诗中社会主义可能得到无穷的、根本不同的和多方面的反映。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倾向的深刻而真实的理解，就没有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共产主义的党性。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能对所有生活问题给予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社会生活不时对文学和批评家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他们做出自觉的、深刻的、创造性的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保障是：一、文学家、学者、批评家的共产主义党性立场；二、他们必须善于不重复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伟大学说，来认识生活的迫切问题。

五月十七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展社论《艺术家的政治文化》。社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每个艺术家提供了同读者、听众及观众进行联系的方法。读者、听众及观众的教育水平和视野向艺术家们提出了更加复杂的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任务。为了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水平上完成这一任务，苏联艺术家仅仅有技巧是不够的。在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中还必须包括艺术家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苏联艺术家的政治文化不仅指深信党和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性，而

且要经常注意学习原著和党的基本文件。艺术家要经常有目的地注意自己的政治教育，艺术家的政治文化可以帮助艺术家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五月十八日 《文学报》报道，苏作协理事会秘书处和苏陆海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奖励在军事爱国主义题材方面有重大贡献的文艺作品而授予法捷耶夫金、银质奖章的决定。

金质奖章授予：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合写的《围困日记》；沃罗比耶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一滴血》和《老人和他的学生们》；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诗集《插诗》。

银质奖章授予：阿乌克巴耶夫的诗集《团结树》，霍夫曼的中篇小说《塔甘罗格的英雄们》和报告文学集《我的同时代人》；科洛索夫的中篇《战争的三个圈》，Б·列昂诺夫的文学专著《人民的精神武库》。

同日 《文学报》报道，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听取《青春》杂志的创作工作报告并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著名作家、各大文艺杂志主编、全国许多青年出版社的代表。在《青春》杂志主编А·杰缅契耶夫发言之后，与会者展开了讨论。发言者首先肯定了《青春》杂志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如体现全民生活根本主题的大型作品少，一些作品主题狭窄，主人公患有幼稚病。一些小说缺少社会热情、英雄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反映农村生活，反映热爱土地，热爱自然和农业劳动的青年的作品少。编辑部有时降低对作品的质量要求，政论文章不够深刻，有报道性质等。

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对讨论作了总结。他指出，苏共中央文件强调，苏联的新一代需要在精神上和时间上都与之接近的正面英雄人物。为青年人写的作品中更需

要这种人。

同日 第十六届全艺电影节在列宁格勒结束。故事片获大奖的是：《个人生活》，《情投意合》和《天才的青年时代》；获青少年影片大奖的是：《男人的教育》；动画片获大奖的是：《有这么一条狗》和《秋天》；纪录片得奖的是：《射击手群英会》；科教片获大奖的是：《冰上的条纹》。

最佳女演员奖授予柳德米拉·古尔钦科（主演《两个人的车站》）和索科洛娃（主演《希望与支柱》）。

最佳男演员奖授予奥·扬科夫斯基（主演《情投意合》）。导演梁赞诺夫因对发展喜剧片所作的贡献而获奖；影片《希望与支柱》获现代农村政论题材奖；《星星和霍金·穆里塔耶塔之死》获音乐剧创作奖；《过去几天的歌》获卫国战争期间爱国主义题材奖。

五月二十一日 《苏维埃文化报》刊登关于戏剧圆桌讨论会的材料，标题是《向广度还是深度前进？》编者按指出，会议主要是讨论有关戏剧现状，当前戏剧创作的特点等问题，同时也注意到舞台文学的主流及其发展方向。刚刚投入戏剧创作的青年人带来了对人的生活实质和意义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希望弄清现代人的复杂的感情，确立我国日常生活的永恒规范，突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特点。但是戏剧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往往引起观众的不满，这些性格显然不够积极，鲜明和准确，缺乏吸引青年的品质。因此，解决现代剧的继承性、传统和创新问题，确立现代剧的思想道德力量和作家的公民立场是十分迫切的，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谈到青年人的创作时，评论家西多罗夫说，目前有一批作家涌入文学界，在戏剧中开拓着新的生活层次，扩大了

描写的生活面。但是只有从美学上开掘到一定的深度，并且阐明了社会关系发展的主流，才会逐渐变成艺术现象。同时还要使冲突和事件充满高度的道德内容，才能引起观众的深思和共鸣。只有对生活有具体准确的认识并加以深刻的思考才会产生艺术奇迹。必须勇于提出对于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要看到世界所处的紧张局势。

作家阿廖申指出，话剧《第二〇六》和《我的幸福》是两部属于道德伦理题材的日常生活戏剧，但它们超出了所表现的范围，成为具有公民感和爱国主义、涉及到我国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戏剧。

青年剧作家代表斯拉夫金指出，作家要写有特色的作品，不能对青年作家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

在该到戏剧与生活，主人公与时代问题时，剧作家萨伦斯基说，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话剧一旦试图真实地反映生活及其中的尖锐冲突，作者马上就陷入复杂的境地，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作家要干预生活，就要求具有创作积极性和坚定的公民立场。

一些作家指出，现在有的主人公已经摆脱了公式化的束缚，舞台上的人物不仅面貌不同，而且性格各异，这是现代戏剧的重要成果。

在谈到戏剧评论时，作家施泰因说，一次粗暴的指责和吹毛求疵的讥笑就足以使青年作者就此搁笔。奇奇科夫说，一位戏剧家看了一场戏，抛出一篇“谩骂”文章时，管理戏剧的文化机构便急忙做出结论，这是不对的，应该区别评论与“组织结论”的关系。

在谈到戏剧体裁时，作家们呼吁恢复喜剧体裁和悲剧体

裁。

六月七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表社论《剧院的党的会议》。社论说，有些单位党组织没有定期召开会议，会上不讨论迫切的问题，作报告没有充分的准备，对一些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社论具体批评了库兹巴斯歌剧院风气不正，演出人员流动性大，以致剧目不能顺利上演，而共产党员对这些严重问题却无动于衷。

社论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有效的抓整个创作活动，抓演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抓好党员与非党员的马列主义学习，把理论同该单位的具体任务联系起来。

六月八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文艺创作与批评》。社论指出，党所关心的是如何使批评成为文艺创作的有效因素，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人道主义理想，扩大苏联艺术大师的思想视野并提高其技巧，但是文艺批评的现状还不完全符合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文艺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报刊发表的评论经常是肤浅的，捧场的，不能说明作者的真正意图。刊物的编辑部对作品的质量缺乏严格要求，因此才出现一些对复杂材料抓不住要领，世界观混乱，不善于或不愿意用历史的眼光和明确的阶级立场来观察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的作品。一些作者随心所欲地主观地评价苏联文艺发展的某些时期，把文艺发展史上的某一个十年同另一个十年对立起来、过分突出某些艺术家的作用，而又贬低另一些艺术家创作的意义。有些作者以露骨的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苏联文学艺术的重要传统和革新经验，这是不能容忍的。应该现实地、以党的立场来叙述人民的过去和现在，既不要粉饰现实，也不要拿缺点来大做文章，批评不良现象时不能用庸

俗的抱怨和抹黑的办法来取代公民热情。在剖析艺术家的创作时应新老作家一视同仁，讲原则，从思想美学上严格要求，党欢迎文艺批评干预生活，创作正面人物和形象，但不支持粗制滥造的作品，不能用题材的迫切性来掩盖灰色的、艺术上贫乏的作品。

同日 《文学报》刊登苏作协理事会书记B·科热夫尼科夫的文章《崇高的义务》。文章说，苏联文学的崇高威望取决于它的党性、人民性、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方针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党经常注意和关心苏联文学的繁荣和文学家的创作，因此每个文学家要严格评价自己作品，要有公民责任感，对自己所写的和所说的东西要有严格的艺术要求。

苏共二十六大的决定和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的决定是苏联文学向思想和艺术新高度前进的方针。它引导作家去注意重大的，有社会意义的社会问题，去表现我们时代的正面英雄。劳动者及其社会、道德、精神的潜力是文学创新的主要领域。

党号召作家加强文学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许多文艺杂志在五年计划的重要建筑工地长期派驻作家，同劳动集体签订合作条约，这有助于深入研究迫切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发现人们性格中和相互关系中的新东西。

深入生活，同党和人民一起站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最前线，为和平而斗争，这是苏联作家的光荣使命，是时代要求的崇高义务。

六月九日 《苏维埃文化报》发表社论《英雄主义的源泉》。社论说，摄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影片在今天也是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最近放映的战争题材影片中，绝大部